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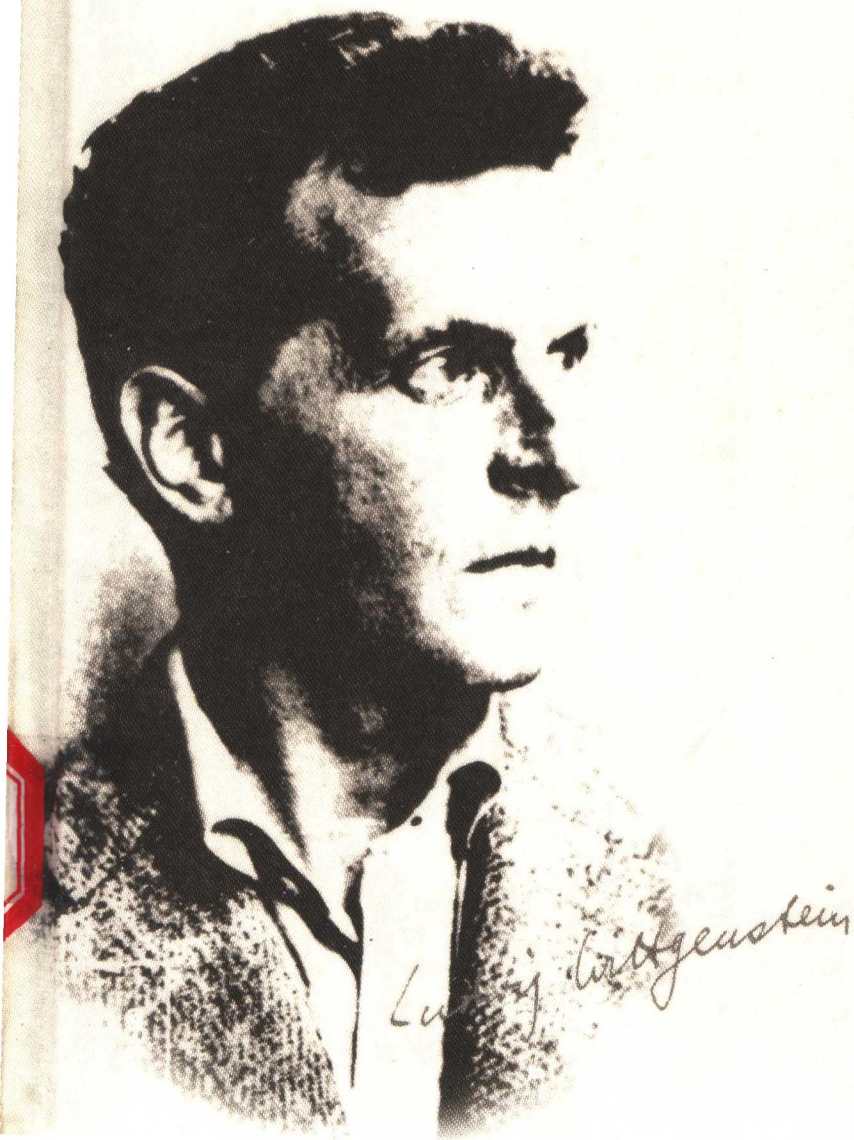


L.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全集**

第 2 卷

涂纪亮 主编

黄裕生 郭大为 译



维 特 根 斯 坦 全 集

---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与维也纳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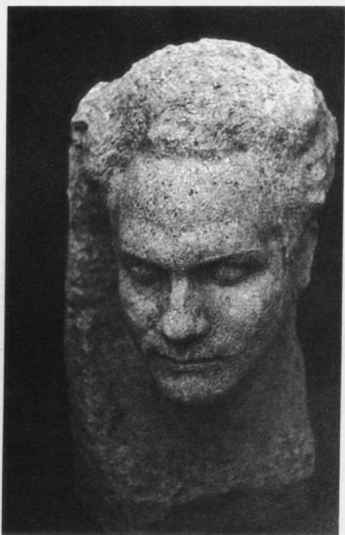
---

2

B.F. McGuinness 编  
黄裕生 郭大为 译



十岁时留影



半身雕像（迈克尔·德罗比作）

## 译者前言

黄裕生 郭大为

本书译自德文版《维特根斯坦著作集》第3卷《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Ludwig Wittgenstein and der Wiener Kreis)。这一卷是由B.F. 麦吉尼斯编辑整理的。本卷第一部分至第七部分的材料来自弗里德利希·魏斯曼记录在七本学生笔记本里的笔记。这些笔记是关于1929年至1932年间先后进行的学术会谈的记录。维特根斯坦是会谈的主角,魏斯曼有时与石里克一起参与会谈,有时则单独与维特根斯坦见面。

本卷还有两个附录。这两个附录材料已不见于魏斯曼的记录。附录(一)讨论了一些数学问题,魏斯曼可能在1929年12月前与维特根斯坦讨论过数学问题,并把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记录了下来,但这些记录已散佚。西姆松·施泰因(Shimshon Stein)在1930年底曾在维也纳读到这些记录的复印件,并作了摘录。这里作为附录(一)发表的,就是由施泰因提供给本卷整理者的摘录。附录(二)则是魏斯曼在1931年初完成的关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两份提纲手稿中较晚的那份。这部分材料是由约索夫·舍希特博士提供给本卷整理者的。

本卷的翻译工作是由黄裕生、郭大为共同完成的,编者说明、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第三节由黄裕生译出,其他部分由郭

大为译出。译完之后,我们互校了译文,并对一些人名、重要概念的翻译进行了统一。在翻译过程中,有关数学方面的问题,黄裕生曾请教过罗嘉昌先生,涉及语言方面的一些困难,曾得到张慎女士的帮助。我们对维特根斯坦著作虽有一定阅读经验,也曾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有过兴趣,但我们都没有作过专门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最恰当的翻译者。特别是本卷还涉及到数学等具体科学方面的问题,更给翻译增加了难度。因此,我们虽然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但仍可能出现一些错误和不妥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卷中的所有脚注除特别标明外,都是德文版编者所加。

## 编者说明

### 1

这本书所发表的材料取自弗里德利希·魏斯曼记录的遗稿。有两部分例外,其中有一部分(本书的附录二)在他的提纲副本里也是没有的,这部分是由耶路撒冷的约索夫·舍希特博士提供给我的;关于数学哲学的记录的一些部分(本书的附录一)也是同样的情形,这部分是由特拉维夫的西姆松·施泰因先生所作的摘录提供的。

这类材料都不能无限制地看做是魏斯曼自己的著作。因为一切都要追溯到那个年代,在那段时间,维特根斯坦有许多保留和疑虑,因而乐于借助魏斯曼拟定的报告在维也纳传播他(维特根斯坦)的观念。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逐渐不满意于这种方法,转而与魏斯曼进行充分合作。而在他对这种方法也不满意之后,他通常只是通过与石里克的聚谈和传递他的蓝笔记本以及其他谈话记录来把他的哲学观念传达给在维也纳的朋友们。

魏斯曼可能把维特根斯坦关于数学哲学的许多观念吸收到了他在1938年首次出版的著作《数学思想引论》一书里;当

然,这本书主要是魏斯曼自己的著作。<sup>①</sup>但是,他的《逻辑·语言·哲学》一书却迟迟没有出版,虽然在1929年至1931年间曾多次预告要出版,或许正是因为他在一再修改。最后终于在1965年魏斯曼死后两年,才以作了很大改动的形式出版英文版,并改以《语言哲学原理》为书名。

2

在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中,最早付印的材料是在1929年12月记录下来的谈话内容。这一年维特根斯坦是在剑桥度过的。他重又把哲学当做主要工作这件事或许要追溯到这一年。当然,正如人们所能预料的那样,在更早的20年代,由于受自己和他人的激励,他就已经有更多的机会重又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F. P. 蓝姆塞(Ramsey)在1923年曾多次访问他,1924年又访问他,差不多每隔六至七个月一次。两人讨论了《逻辑哲学论》这本小册子,维特根斯坦对英文翻译提出了一些第二版得到实际采纳的修改意见。他们还讨论了数学的基础,并且讨论了对数学原理进行必要的修正。但是,蓝姆塞在1924年3月24日给凯恩斯(Keynes)的信中写道:维特根斯坦显然在致力于寻找某种思想,每个人都要像他那样受激励。维特根斯坦自己(1924年7月4日)也对凯恩斯说:“你写道,为了使我能够重新进行科学工作,你是否能做些什么;不,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因为我自己已没有了再去做那种工作的强烈的内在动力。我真正想说的一切,我都已说了,因此,泉水已经枯竭。这听起来很古怪,但情形

---

① 关于维特根斯坦对这部著作的贡献,可参见该书第二版,第168页,维也纳,1947。



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契机。还在他获得博士学位的特别时期，一个他将展开的计划已提了出来；他在1925年对英国的访问还只是限于他的朋友。

在这期间，《逻辑哲学论》在维也纳备受欢迎。数学家汉斯·哈恩(H. Hahn)在1922年开设了一个关于此书的研究班，哲学教授莫里茨·石里克与数学教授库尔特·莱登迈斯特(K. Reidemeister)(两人1922年均任职于维也纳)都对此书有极深的印象。所以，石里克在1924年12月25日给维特根斯坦的信写道：

作为您的《逻辑哲学论》的赞赏者，我早已想与您取得联系。但是，职务的负担以及其他责任一再延误了实现这一心愿，虽然我在维也纳的任职已过去了五个学期。在哲学研究所，我习惯于每个学期定期举行同事和有才华的学生的学术聚会，他们都对逻辑数学的基础感兴趣，在这个小组里面，您的名字经常被提到，特别是在我的同事即数学教授莱登迈斯特对您的著作作了一次评论以来，更是如此；这一报告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这里有许多人——我把自己也算在里面——都确信您的基本思想的重要性与正确性，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热烈的愿望，即共同传播和阐发您的观点……(石里克接着问维特根斯坦，如何才能得到他的《逻辑哲学论》的副本)……如能亲自认识您，我将特别高兴；如果可能，我希望在普赫堡有机会造访您。<sup>①</sup>但愿您能让我认识您，并希望不会因此打扰您田园式的宁静。

---

① 维特根斯坦在秋天实际上完全出人意料地移居奥特塔尔。石里克可能是在夏天从蓝姆塞那里得到维特根斯坦在普赫堡的地址。

维特根斯坦是在过圣诞节假期回到奥特塔尔时收到这封信的,并于1925年1月7日很客气地给石里克回信说,他自己也没有《逻辑哲学论》的复写本。他对石里克的访问计划表示了由衷的高兴。石里克在1月14日的回信中再次表示他将造访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石里克直到1926年4月底前仍没有实现他的访问。因为当他与一些得意弟子前往奥特塔尔时,他发现维特根斯坦已放弃他的教职,并离开了那个地方。石里克致信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他到维也纳,十分欢迎他来访;维特根斯坦虽然对石里克有好感,但他似乎还是放弃了拜访石里克的念头。1926年秋天,维特根斯坦忙于给他的姐姐玛格丽特·史通伯鲁格夫人设计在昆德曼喀索的住宅。史通伯鲁格夫人在维也纳的社交圈和知识分子圈是个著名人物,是她最终使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会面成为可能。石里克把自己的一部著作送给维特根斯坦,并建议他与其他几个人见面,以便讨论逻辑问题。史通伯鲁格夫人在1927年2月19日写道:

他让我转达他对您的诚挚问候,并向您表示真诚的歉意:他确信,他目前的状态使他不可能在着手眼下需要他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的同时,专注于逻辑问题。无论如何,他也想与更多的人讨论。与您,尊敬的教授先生,讨论这件事,他曾一直认为是可能的。而且似乎正如他认为的那样,他眼下在这件事情上能够为您做些有益的事。

此后不久,为了安排与维特根斯坦见面,史通伯鲁格夫人设午宴邀请石里克。石里克夫人这样回忆道:“史通伯鲁格夫人的邀请使他(石里克)非常高兴,并给他带来期望。不过,这

次他的希望没有落空。(就像上次在奥特塔尔被错过的访问时的场合一样)我重又有趣地看到朝圣者般的那种恭敬态度。他进入了一种陶醉的状态,说得很少,我感到,我似乎不允许提任何问题。”<sup>①</sup>而维特根斯坦对此次会面的反应则多少带有苏格拉底式的嘲讽。“我们相互认为都有些精神失常。”他第二天对他的朋友、当时的建筑师伙伴保罗·英格尔曼这样说。不过,正如英格尔曼说的那样,两人很快就和谐了:“维特根斯坦觉得石里克是一个水平很高、理解力很好的对话者,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

显然,是在与石里克的多次交流之后,维特根斯坦才同意与石里克周围的其他成员见面。当时与石里克最接近的魏斯曼几乎每次会面都在场,卡尔纳普教授有时也参与,他是维特根斯坦见到的维也纳小组的第三个人,<sup>②</sup>此外,H. 费格尔教授和 M. 卡丝帕小姐(现在的费格尔夫人)也经常参与见面。维特根斯坦当时忙于其他事情特别是忙于他的建筑学方面的事情,所以,并不总是有准备去讨论哲学。有时他更喜欢以背对听众的方式为大家朗诵诗歌特别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诗。但是,维特根斯坦还是有许多机会去解释或者详细地阐明他的观点,人们曾受这些观点的启发和激励。对在 1927 年至 1928 年间进行的这些会谈,似乎没有什么记录。不过,即使排除关于数学哲学的讨论和蓝姆塞关于《论数学的基础》的报告,仍可以找到一些记录。在 1927 年夏天,石里克和魏斯曼显然是维特根斯坦与蓝姆塞之间关于同一性的信的中转人,其中的哲学部分被重述于后面(本书第六部分“关于蓝姆

① 我关于石里克想见维特根斯坦的努力以及最后的结果的报告,都是根据上面所引的同时代人的书信和已经去世了的伯兰茨·石里克夫人的回忆。

② 卡尔纳普在其“自传”《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哲学》中对这些会谈有特别有趣的记录。

塞的同一性的定义”一节)。石里克在1927年8月15日给维特根斯坦的信(此信包含着蓝姆塞的回答)里说,他将于11月重返维也纳,并表达了他的希望:

请您作些准备,以便继续小型的聚会,我希望聚会从我们的周一晚上开始。您一定已感到,经常与您进行讨论会给我们带来多么纯粹的喜悦。

在10月他又补充说:“我乐于承诺,在聚会上将不涉及科学。”

不过,这些聚会并不是后来作为维也纳小组而闻名的那些学术聚会。因为维也纳小组的那些学术聚会是在每周四晚举行,石里克在1928年6月曾邀请维特根斯坦参加一次那类聚会,但是,维特根斯坦是否参加此类聚会,仍是可疑的。维特根斯坦于1927年至1928年间在周一学术讨论会上的论述似乎也没有成为周四学术聚会讨论的对象。

维特根斯坦似乎参与的惟一正式的哲学事件是布劳威尔(Brouwer)在1928年5月作的一个讲演。魏斯曼和费格尔教授起初难以说服维特根斯坦出席此次讲演,而事实上,该讲演给了他异乎寻常的触动。

### 3

1929年,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维也纳小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年秋天,昆德曼喀索的房子已竣工,在拖延一段时间之后,维特根斯坦前往剑桥旅行。为了度假(如他对凯恩斯说的),他曾于1929年1月到过那里。不过,不久他就决定(或许他早已下决心)留在剑桥,以便从事他的哲学工作。

## 编者说明

我决定在剑桥逗留一些时日，并研究视觉以及其他事物……请您向朋友们特别是魏斯曼先生问好；我希望并很高兴在一个月后能再见到您。（1929年1月18日致石里克的信）

在复活节休假期间进行的会谈，没有报道记录，但是，这一年是紧张且具有令人满意的积极性的一年。维特根斯坦从石里克熟悉的话题转向了与算术相联系的问题。他发表于《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增补卷第9卷（1929年）里的文章写的是：《略论逻辑形式》（*Some Remarks on Logical Form*），但是，在学术聚会期间（在此类聚会上，这篇文章应当被讨论过），他作的却是关于数学里的无限者的报告。大概是在（1929年6月至7月）这段时间，他给魏斯曼写道：“最近这段时间，我工作非常忙，并卓有成效；我很乐于就此向您作一些说明。”但是，不久前结婚的魏斯曼在那年夏天却没有见到维特根斯坦。当时正好在美国的石里克也没有能见到他；石里克的缺席是写那封信的部分原因。为了能与维也纳的朋友们在一起，那年早些时候，石里克曾放弃波恩的聘请。为此，大家决定呈献给他一部著作，向他表示敬意，这部著作应当囊括关于重要的共同见解、出版物以及以他为核心的学派的先驱者的报道与记录。这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著作：《科学的世界观》（1929年，维也纳），该书在1929年9月于布拉格举行的第一次精确科学认识论学术讨论会上与读者见面；其中用皮革精装的一册赠送给了石里克。这件事似乎就是维也纳学派的命名事件；紧接着的第二年，维也纳学派通过哲学年鉴杂志就作为一个哲学运动而产生影响。

这样的发展显然并不合维特根斯坦的志趣。还在筹划

《科学的世界观》一书时，他就给魏斯曼写道：“正由于石里克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所以，人们要谨防用‘好意’的说大话来使石里克和以他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成为嘲笑的对象。我之谓‘说大话’，是指任何形式的自鸣得意的自我欣赏。‘拒斥形而上学’！这好像是什么新东西似的。维也纳学派做出了什么，它必须展示出来，而不是光说……著作就是对大师的赞颂。”

许多年之后，此书看起来并没有出现维特根斯坦深为忧虑的那种情况；在它出版之后，维特根斯坦对它持什么看法，人们也不得而知。除了阐述和报道学派的基本原则外，该书还包括了一个实用的文献目录，魏斯曼关于《逻辑哲学论》的内容的研究心得，以及关于正在出版中的魏斯曼的著作《逻辑·语言·哲学》的预告（此著作当是关于《逻辑哲学论》思想的引论）。魏斯曼这部著作的第一稿部分现存于魏斯曼的遗稿中。在这一时期，它们还没有超出《逻辑哲学论》。因此，在《略论逻辑形式》一文中表达出来的新思想，以及更早一些的在本书中加以复述的那些会谈没有得到回应。

或许是由于维也纳小组作为一个哲学学派出现，使维特根斯坦退了回去。不管怎么说，此后他与维也纳小组的联系只限于与石里克和魏斯曼的会面。小组其他同仁再也没有见到他。

夏天，石里克在斯坦福，维特根斯坦只能通知说：他的工作有很大的进展，他希望与石里克讨论最后的结论，并且不久将会有机会。他回维也纳过圣诞节创造了见面的机会。他在石里克家里与石里克、魏斯曼至少见了六次，被复述于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魏斯曼在这些会面期间或者在这些会面之后所做的笔记。记录的语调比以前更加客观严格。魏斯曼甚至可能是一边讨论一边进行记录（我们将努力展示这一点）。这两个证据：第一，维特根斯坦已经告知了结论，并且声明

说,将在剑桥举行讲演;第二,维特根斯坦已看到(正如从1932年的一封信中显明的那样),这些会谈是把他的思想材料提供给石里克周围(小组)的其他成员使用的途径。

不管怎么说,这些是最初被记录下来的会谈,我们今天拥有的也只能是这些记录下来的会谈。在最初的两天,记录的只是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但在节日结束前夕,维特根斯坦显然结束了对他的思想的阐释,所以,人们(在接下来的会谈记录中)更多看到的是评论、追问、与石里克和魏斯曼的辩论,以及维特根斯坦关于胡塞尔、海德格尔、魏尔的思想的并无准备的讨论。

在复活节,维特根斯坦又一次重返维也纳。不过,在这期间,见诸记录(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的却只有一次聚会。正是在这次聚会上,维特根斯坦阐释了他对陈述与假设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分对维也纳小组产生了一定影响。

1930年夏天,有关于两次学术聚会的记录(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在第一次学术聚会上(7月19日),维特根斯坦为魏斯曼解释了他关于数学主题中的数的观点,魏斯曼当时准备在将于11月在柯尼斯堡举行的第二次精确科学认识论会议上作一次报告。维特根斯坦完全赞同这一计划,而且当夏天看起来魏斯曼似乎参加不了会议时,维特根斯坦还深感失望。不过,魏斯曼届时还是成功地与会了,而且他的报告《数学的本质:维特根斯坦的立场》与卡尔纳普关于数学的纯粹逻辑基础的报告、基廷关于数学的公共性基础的报告以及诺依曼关于数学的形式主义基础的报告一起组成了重点组的报告,虽然在会议议程中没有预告,魏斯曼的报告在会上还是作为重点组的第四报告进行。(上面提到的)后三个报告后来都发表在《认识》第2卷上(1931年,第91页以下);只有魏斯曼的报告稿没有送到编辑手中。

在讨论中, 汉斯·哈恩和卡尔纳普都提到了魏斯曼的话。汉斯·哈恩还谈到维特根斯坦与直觉主义者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的争论: “这种观点认为世界是由诸个体、个体的属性以及这些属性的属性等等构成的。而逻辑公理则只是这个世界的陈述。”汉斯·哈恩和卡尔纳普提到的其他要点可在保存于魏斯曼遗稿中(经过严格校对过)的报告之第一部分的打印稿中找到。这些要点有: 演算与函数之间的区别(参见附录一), 以及以下面的方式表述方法论原则:

一个数学概念的意义就是它的使用方式, 一个数学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

报告要讨论的内容如下:

1. 数的性质。
2. 无限的概念。
3. 集(合)的概念。
4. 充分归纳(法)的原则。

但是, 只有第一部分得到保存, 或许连这一部分都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在附录(一)里, 人们可以发现关于数学的一些见解, 这些见解大概是魏斯曼即时记下的, 他把它们当做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的记录而让其在一些朋友们中流传。1930年底, 施泰因先生在维也纳曾看到这些记录的复印本。附录中的一些片断包含有施泰因从魏斯曼现已属散轶的那部分记录中抄下的摘录。最近被重新发现的英格尔曼的记录有一个标题, 叫“维特根斯坦的口述(记录于1930年前)”。当魏斯曼准备发表他在柯尼斯堡的报告时, 附录(一)里的材料似乎是在1930年底才打印复制完毕, 但是, 作为这类材料的来源的会谈完全可能是在1929年12月前进行的。这或许能解释附录(一)里的材料的缺失。

我们既不是在附录(一), 也不是在魏斯曼1930年夏天的



评论中,不是在《认识》关于柯尼斯堡学术讨论会的报道中,可以找到维特根斯坦反对弗雷格和罗素关于数的定义的论点线索。此论点后来于1930年秋天在剑桥首先得到了阐释,而这里则是作为对在柯尼斯堡讲的内容的补充发表出来。

虽然在8月接近于完成的著作因另一文稿而中断,魏斯曼还是很高兴在柯尼斯堡作他的报告。他认为,这是公开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并且引起人们对他的应有关注的最合适的时机。这一报告虽然被大会郑重地接受,并且被作为第四个报告而与三个最重要的哲学学派的报告并列,但是,魏斯曼对它的出版的耽搁(或许由于维特根斯坦已发展了新的思想),以及哥德尔在柯尼斯堡公布的发现给人的深刻印象而大大减弱了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

魏斯曼在给石里克的信中写道:他在9月10日返回维也纳,并将在20日见维特根斯坦。所以,在第二次谈话时,石里克显然不在场,这次谈话就像第一次谈话一样,是以维特根斯坦不间断的解释为主的。

4

1930年晚些时候或者1931年初,魏斯曼完成了他的提纲手稿,并且以两个并没有本质差别的打印稿形式把此提纲提交给他的朋友们,其中一个明显较晚的文稿在这里作为附录(二)付印。这些提纲可能构成了他的著作《逻辑·语言·哲学》的一部分,或许就构成了关于语言的那部分。

提纲最主要部分的较早文本在魏斯曼遗著中以“维特根斯坦引论”为标题出现,它也讨论哲学,虽然是以很零散的方式进行这种讨论。魏斯曼在1930年5月8日作的报告《逻辑的本质》的文本(它也被保存在他的遗稿中)构成了计划中的